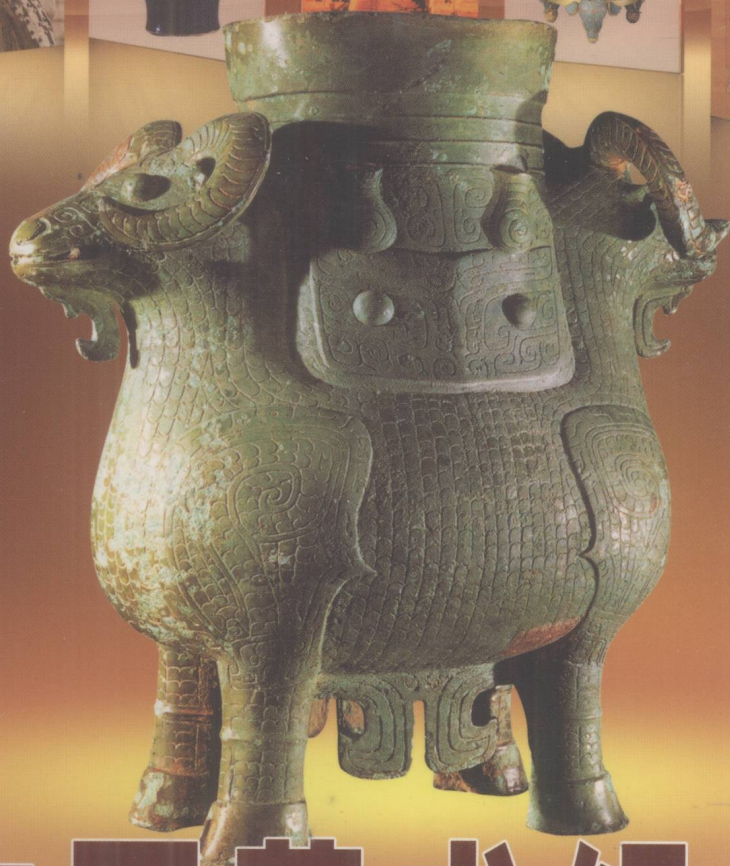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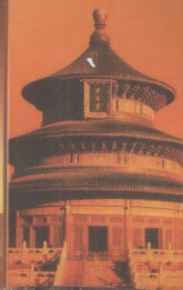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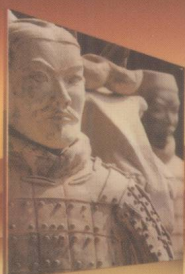


文化百科系列



中国艺术经典

陈晓丹 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艺术经典 4

陈晓丹 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艺术经典.4/陈晓丹 编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9.8

ISBN 978 - 7 - 104 - 03031 - 7

I. 中… II. 陈… III. 艺术 - 中国 - 通俗读物
IV. J12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3188 号

中国艺术经典 4

策 划:魏志国

责任编辑:张月峰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 话: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 1035mm 1/16

印 张:60

字 数:552 千

版 次: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104 - 03031 - 7

定 价:298.00 元(全 4 卷)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言

艺术是什么？首先它是被创造出来的。它是一种进步的象征。在压力下的动力，在生活中它让所有的生物突破常规。通过艰苦努力过程和充满创新的思想互相结合演变为以后的神奇，从而创造出一副出众的艺术品。

从根本上说它是被一种求生欲所激发出来，它是优胜劣汰的产物。每个人都会发现很多“艺术品”，而且每个人的标准也都不一样，那到底什么才是艺术？当人类双脚落地的那一瞬间，他就充满了好奇心，当他的好奇心得到极大满足而除了用神奇之外无法形容面前的景象或事物时所表现出来的效果就是艺术感已经在逐渐形成了。通俗的讲：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当人通过东西来表现出他的思想或才能的时候，他就是在创造艺术。如果创造的结果给予大众以完美感“视觉满足或听觉享受”那就是一件绝对的艺术品。

本书从书法、绘画、建筑、服饰、民间传统工艺等多方面地展现了中国艺术的魅力，让青少年在阅读中受到传统艺术的熏陶，提高自己的人生品味。

目 录

第一章 诗 经	1
第二章 诸子散文	5
第三章 屈原与楚辞	16
第四章 史 记	23
第五章 魏晋文学与陶渊明	32
第六章 李 白	37
第七章 杜 甫	44
第八章 小李杜	50
第九章 词	57
第十章 元曲双辉	68
第十一章 中国古代小说源流	75
第十二章 早期长篇章回小说	79
第十三章 《聊斋志异》	89
第十四章 《红楼梦》	95
第十五章 古代城市	104
第十六章 皇权独尊	118
第十七章 神的殿堂	135
第十八章 涉园成趣	161
第十九章 乡土建筑	171
第二十章 装饰艺术	185
第二十一章 西风东渐	194
附录一 体育与博弈	203
附录二 服饰	218

第一章 诗 经

十五国风

普通中国人谈到《诗经》，往往指的是《诗经》中“国风”这一部分，而“国风”当中的爱情诗也颇为多姿多彩，有的一往情深，有的放纵恣肆，有的朴丽清新，都是“天地元声”，而无矫揉颓靡之象。

“诗”的开篇，国风的《周南·关雎》便以男女相慕开始：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句诗，大概是中国最著名的诗句之一，提到《诗经》，人们大都会想到这句诗。“雎鸠”据说是一种水鸟，宋朝理学家朱熹说这种水鸟“尤笃于伉俪之情，说者谓其一或死，其一亦即忧思不食，憔悴而死”。虽然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他的着眼点是在雎鸠的“忠贞”——配偶死去，自己也不独活，但结合汉代以来儒家正统派对《周南·关雎》是“咏后妃之德”的定论，朱熹实际上是在要求女性的“忠贞”，要求女性守节或殉节是宋朝理学的一大特色。说雎鸠“忠贞”当然都是后人附会在《关雎》上的“过度阐释”。在最初的诗作者那里，恐怕主要地还是表达一种对所爱之人的思慕之情。尽管我们今天也还不能确知“雎鸠”是一种怎样的鸟，但大致可以想象，这种鸟是雌雄双飞双栖、感情甚笃。诗人看到鸟儿“相爱”的情景，不由得触动自己的相思之情。于是他吟咏起来：“关关”地叫着相互应和的雎鸠，在河里

的小沙洲上；美丽娴静的姑娘，是我的好伴侣呀。接着诗歌抒发了他对姑娘的思念之情，寢食难安，梦想着有一天能够获得姑娘的芳心。

《诗经》当中的爱情诗篇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所爱对象的可望不可及是诗人反复吟咏的主题，也是最打动人、给后人最多想象的，《关雎》如此，《蒹葭》亦然。

《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就是芦苇类植物，法国哲人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株会思考的芦苇”，已明言人之脆弱。而这首诗歌，以“蒹葭”起兴，“起兴”指诗人由一事物引发自己的诗思，柔软的芦苇在秋天的水边摇曳，爱人似乎就在对岸，等我设法接近时，发觉道路漫长，而爱人似乎永远在一处不可及的“水中央”。这首诗写出了思念“伊人”的惆怅之情，或许他们曾经相恋过，而此时则为水所隔，苍凉迷蒙的秋色与诗人的心情相近。

当然，《国风》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其中还有很多的农事诗、战争徭役诗。如《豳风·七月》就是著名的有关农民生活的诗歌，写了他们一年的辛勤劳作。

比起《雅》、《颂》来，《国风》的语言更接近口语，在《雅》、《颂》中凝重呆板的四言重新又变得活泼生动起来。《国风》中还有许多美丽无边、灵动旷达或忧怀深广的诗句。

周民族的史诗

学者们通常会注意到《诗经》的“史诗品格”，而推崇《大雅》当中的一些篇章。《大雅》当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五篇被当作周民族的史诗。在西方，“史诗”的概念首先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而代表性的作品是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从诗的体制来看，即使是上述五篇也无法和荷马史诗相提并论，但以韵文的方式来讲述本民族起源时期的英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却使这几篇具有了史诗的品格，叙述的是周民族从部落时代直到战胜殷商的故事。这是周民族的史诗，先王的形象各具特点：后稷善农耕，公刘淳朴正直，古公亶父有远见、能创业，文王以美德著称，武王以军功武力平定天下。这些诗歌在周初被写定，先前已经在民族中流传了很长时间，神话的影响尚未消散，先民们带着天真的世界想象，把自己的祖先塑造成半人半神。

《生民》讲述的是周民族的始祖后稷的生平故事。后稷的母亲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就是说姜嫄在野外行走，看见地上有大脚印，就好奇地踩上去，内心受到震动，之后就怀孕生了后稷，而这大脚印实际上是神的足迹。童贞女感神意而受孕的事，在西方最有名的当然是耶稣诞生的故事。耶稣诞生时有天使来报告，而且他的父母并不嫌弃他；但后稷出生后，他的母亲起初觉得这个不明来历的孩子有点不祥，就想抛弃他。先是把他丢在路上，好让牛羊践踏，但牛羊经过时却十分小心地绕开孩子；后来把他投到冰面上，但随即就为各种飞鸟所覆盖，免于冻死。这个“天神”的儿子就在奇迹中得以存活，并逐渐长大。后稷长大之后，擅长稼穡，教会族人耕种，族人于是能安居于邠地。后稷的曾孙——笃厚实诚的公刘又带领族人迁徙到了豳，此后文王出生，周民族此时的实力已经十分强大。《皇矣》叙述了文王伐密伐崇的战争，而《大明》叙述的重点则在武王伐商，

写得十分生动。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争，战争的场面在短短的几十个字中得到了渲染铺排——“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写殷朝“正规军”兵士众多，来势汹汹，大有“以大压小”之势；“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駟騶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写武王的对阵，面对大军压力的紧张、警觉，特别是太师尚父如苍鹰般矫健的形象，预示着周民族军队所向披靡，取得最后胜利。

可以说，《诗经·大雅》中的这些篇章，确实构成了周民族英雄创业的史诗。当然，从其体制上与荷马史诗的鸿篇巨制不能相提并论。二者存在很大区别，荷马史诗的叙事性更强，而《大雅》中的这些史诗有着强烈的抒情倾向；荷马史诗由民间行吟诗人在民间传唱，口耳相传，随时增删，而周民族的史诗则是由周朝的史官乐官撰写，在祭祀先祖的仪式上歌唱，基本内容比较固定。

从诗歌精神追求来看，《诗经》和荷马史诗也存在着不同。荷马史诗充满冒险和探寻精神，《奥德赛》虽以奥德修斯的归乡为情节发展线索，但史诗所铺叙的是奥德修斯的冒险经历，是人与自然的斗争与冒险。而《诗经》所记述的还是周民族如何在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中创造自己的文明。人们眷恋的是平静和睦的乡村生活，而并不主动对外扩张，后来的战争也是为了驱逐外敌、反抗暴政。

第二章 诸子散文

《老子》

《老子》又称《道德经》，传说为老子所著。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姓李名聃，春秋时楚国人，出生的最晚年代在公元前 470 年之前。老子属于士阶层，他主张“无为自化，清静自正”。《道德经》共八十一章，分为上篇《道经》和下篇《德经》两个部分。

老子是有自觉意识的哲学家，《道德经》共五千言，“道”在文中出现了七十多次，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乃老子所首创。“道可道，非常道”，“道”是宇宙生成的本源，所以《道德经》能反映出春秋时期中华民族思维抽象能力所达到的高度。同时，老子更是一个朴素的自然主义者，他认为天道自然无为，人世也应顺应天道，以“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作为政治理想。他所关心的是如何消解人类社会的纷争，人的行为能取法于“道”的自然性与自发性，政治



老子像

权力不干涉人民的生活。他所推举的“圣人之治”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圣人”是道家所认定的最高的理想人物，其人格形态与儒家的圣人不同。儒家的“圣人”是典范化的道德人，而道家的“圣人”则体认自然，拓展内在的生命，以“虚静”、“不争”为理想的生活，“尽人之能事以效天地之行所无事耳”。老子的无为，乃不恣意行事、不孜孜营私，以合弃一己的一切心思计虑，依从天地自然的理法而行。不过《老子》的内部也不完全统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愤激者如：“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

老子认为形而上的“道”是绝对的、永恒的，而形而下的一切皆是相对的、变动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这种相对主义是《老子》一书的又一主导思想，不过这段话又透露出老子的执著，他不能完全无为，“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其内心仍“措意于天下”。

《道德经》在语言风格上以精练见长，上引“有无相生”等句是通俗生动的格言。此外，还有如《诗经》韵律跌宕起伏的：“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大意为：深刻了解何为刚劲强雄，却能安于柔静谦卑的地位，好像自己就是那自然流淌的溪涧；甘作自然流淌的溪涧，则不会失去永恒的“德”，因而回复到婴儿似的单纯质朴状态。深刻了解何为有光彩，却能安于暗淡的地位，好像自己就是那可以占卜预测的工具；甘作占卜预测天下的工具，则不会偏离永恒的“德”，回归到终极的真理。

《论语》

老子的学说宣扬的是“无为而治”的出世思想，而孔子（约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则与之相反，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设想古代尧舜文王武王时代为理想社会，力图以自己的学说影响各国领袖，回到上古的清明政治中。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及司寇。晚年设教，有弟子三千，其中特别有名的有七十二人。孔子本人“述而不作”，晚年回到鲁国之后，专力于上古文学和书籍的编订，包括《尚书》、《诗经》、《周易》、《春秋》、《礼》、《乐》。而他的言论主要留在由弟子们记录下来的《论语》中。《论语》虽是纪言之作，孔子的形象却非常鲜明，“夫子风采，溢于格言”。孔子少时贫且贱，及长，为司空，后来又去官离鲁，周游列国，“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遭际困厄，“惶惶如丧家之犬”。但一生无悔其志，始终孜孜兀兀，继往圣，开绝学。中国最优秀的史学家——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自己“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好像面对高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大概也是汉代以降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孔子的基本态度。

《论语》记录孔子的言与行，文字简练，语言雍容和顺、意味深长。孔子的核心思想——“仁”与“礼”，首先都是针对“在上者”而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其中“在邦者”为诸侯，“在家者”为卿大夫，很明显都是对统治者的要求。“仁”是“克己复礼”，是“爱人”，是约束自己回到“礼”所规定的道路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同时也是一套制度和规范，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人民受到礼与德的约束训育，就会有正确的荣辱观。

《论语》虽是纪言的，但人物形象却也栩栩如生，孔子最钟爱的弟

子颜渊（名回，字子渊）的形象就是在孔子的称叹中流传千古的：“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也是孔门弟子中最为好学的，而且人品高尚，“不迁怒，不贰过”，可惜他“不幸短命死矣”。其他弟子也各具特色：子路率直，子贡能言善辩，曾皙脱俗。“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行行”是刚强的样子，“侃侃”形容说话流畅。他们的个性在《论语·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各言其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子路“率尔而对曰”，抢着回答；而最后回答的是曾皙，其志向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时节，和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小孩一起，在沂水旁沐浴，在舞雩台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来。孔子说“吾与点也”，表示自己的想法和曾皙最为接近，但个人使命感使他终身忙碌奔波。

《论语》首创了语录体，对后世的影响也颇长久。《论语》语言贴近口语，所记录的多短论，精粹而有实感，这都是语录体的长处，后来《孟子》、《墨子》、《庄子》当中也都有语录体。到宋代，语录体更得到发扬光大，理学家多采用语录体，程颢、程颐的《二程语录》、朱熹的《朱子语类》，都是非常著名的语录体著作。

《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曾受业于孔子嫡孙子思的门人，其学说上承孔子并发扬光大。孟子对于自己身处时代“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的状况深感忧心，于是他称述上古尧舜之德，以仁义为天下根本。孟子先是在家设教，曾言“君子有三乐”，其一即“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后来又游历各国，见过齐宣王、梁惠王，但因为整个战国时代的情势是“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君王在意的是权谋之术，所以孟子和孔子一样，他的学说很难为各国统治者所采纳，反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一书，有孟子自己撰述的，也有其门徒的记述，总体风格比较一致，文章辞锋锐利、辩才滔滔。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皆善，人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的本性既是善的，那么对人的管理就是引导他把人性中的善给发挥出来，为政者不要阻塞了人的善性。“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人把自己的自然本性发扬出来，就能和家人和睦相处，进而和他人、和社会和睦相处。

作为散文来看，《孟子》与《论语》的简净不同，虽然文章也是对话体，但往往是长篇大论，论辩皆经过精心构思，文章风格气盛辞严，辩士色彩明显。孟子曾自嘲地说：“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为了宣扬行王道，他在论辩中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说自己的主张。《孟子》第一篇《梁惠王》的第一章，是为全篇甚至全书奠定基调的，而这一章，就是以论辩开始的。孟子见到梁惠王，梁惠王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开口就打听“利”。梁惠王的所谓“利”是于梁国有利的富国强兵之“利”，而孟子要强调的是“仁义”，于是回答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



孟子像

着以排比的方式假设，如果梁王关心的是“何以利吾国”，那么，大夫关心的就是“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关心的就是“何以利吾身”，各自关心的是最切身的利益，那么就有可能“上下交争利”，即上下互相从对方那里去取得利益，“而国危矣”。梁惠王才开口问了孟子一句“利”，孟子就以数句对之而宣扬自己的“仁义”之说，这是以排比、连续

的气势说服对方的努力。另外，他也采用问答体，颇有点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孟子在政治主张上提到“行王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他自己的核心思想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强烈的民主色彩，可是未必能为各诸侯国所接受，所以他在讲述了他理想中的“王道”状况之后，又激烈批评当时各国争行“霸道”的严重后果，且是在梁惠王表示“寡人愿安承教”之后与梁惠王展开对话的：

孟子对曰：“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孟子尝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夫。”孟子在其文章中显现的也是这样的大儒的形象。他肯定人的善良的本性，所以他也对自己的本性充满信心，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如果认为自己内心有一个尺度在，那么“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询问自己的良心，如果没有什么不正确的，那么即使有千万人阻挡我也会继续前进。

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像“五十步笑百步”、“揠苗助长”等都成为人所共知的成语。

《庄子》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前286年），名周，战国中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曾为蒙之漆园吏。他生活的时代大约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关于他的生平人们所知甚少，只在《史记》当中有简略的介绍，不过从庄子留下的著作里还是能够比较充分地了解他的思想。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庄子》一书共有三十三篇，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公认是庄子的作品，外篇和杂篇中也仍有不少思想和他比较一致的作品。庄子用文学形式来表达道家的哲学思想，由于其书瑰玮、言辞参差而恢诡，因此，《庄子》一书较之其他诸子书显得繁复、神秘、美丽，开启了中国文学上“浪漫主义”的潮流；而庄子的哲学思考方式对后世影响很大，魏晋玄学与禅宗都承其衣钵。庄子的哲学，对政治统治影响不算大，但在塑造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方面起到的作用却不小。他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视“至人无己，神人



庄子

无功，圣人无名”为理想人格，认为道德高尚的“巨人”能达到忘我的境界，精神世界超脱于物质的“神人”不计功业，修养完美的“圣人”不求名誉地位。他的文章有着极为阔大的精神境界和强劲的精神力量。庄子的散文描绘的是一个广大无比的空间，他写道：

北冥有鱼，其名为